

●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理论思考

朱 传 荣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荣(1928-), 男, 山东滕州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划时代意义, 就在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 是科学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关键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 先进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B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133-07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还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里所蕴含的重大理论意义, 是我们应当努力思考和认真研究的。

一、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 首先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因为, 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新发展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既是党领导革命胜利的理论前提, 又是党牢固执政、永葆先进性的理论保证。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验证了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的光辉奋斗历程表明, 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和胜利, 就在于坚持了从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为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理论结晶,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第 126 \ 127, 43 页)。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两大主题的形势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它突出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进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着眼于执政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它深刻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自觉坚持这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关系党和国家盛衰与兴亡的理论原则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既是对全党的庄严忠告,也是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失败教训的理论总结。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彻底失败,不能归罪于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而是因为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从理论上说,列宁不搞教条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行动指南,看做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从当时的俄国国情和国际背景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俄国的实际,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可以取得胜利的理論,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场空前伟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新境界。新政权建立后,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问题上,列宁做了艰辛的摸索。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到准备推行的新经济政策,都表明了列宁是在谨慎而踏实地实验。但这种实验刚开始,列宁就逝世了。而他的事业继承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却与列宁是不相同的。他们在理论上搞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顾俄国经济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探索中所概括的某些理论观点搬到俄国的实践中。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前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取得了短时的成效;但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苏联过早地宣布已经消灭了私有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以大国主义姿态压制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按照本国国情制定政策的势力,反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后继者虽然也有社会主义改革的愿望和倾向,但主要着眼于领导人的个人功过的评论和领导层的更叠上,而不是为了开辟未来,更没有从实际上研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他又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第 272, 292 页)。所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不能归罪“十月革命”,更不能归罪于列宁。

事实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缺乏或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开拓性研究,没有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第 742-743 页)。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格·克留奇科夫在“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苏联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命运的悲剧性结局。其一,在党的建设中,在

领导党和国家的实践中,……列宁的遗训被忘记并遭到了破坏;其二,藐视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教条化,党的领导干部丧失了政治活动家的素质”。又说:“轻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后果是,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人中就没有出现过思维敏锐、政治嗅觉灵敏、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政治立场鲜明、阶级方法彻底、具有理论概括和作出重大政治结论能力的活动家。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我们未能期盼到”^[4](第7-8页)。又如,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届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提出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波兰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在理论上既划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也划不清楚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就连因反对搬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张社会主义改革而被赶下台的波兰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也是如此。1956年,在他重新上台之后,本应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重心,可是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波兰党九中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党内思想上主要危险”的理论,他为了“避免滋生修正主义”,把锐意致力于波兰社会主义改革、由波兰经济学界优秀学者组成的“经济委员会”也下令予以解散。理论上的是非不清还表现在他们对待理论家沙夫的问题上。沙夫早就提出以人道主义溶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对列宁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波兰历届领导者对此却迷惑不清。当经济上需要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时,就把沙夫的理论批判一通,甚至在苏联的压力下,把沙夫开除出党。可是当经济上有好的转机、国内民族势力起作用时,又为沙夫平反,恢复其党籍,并将其选进党中央委员会。这种思想理论原则的混乱情况,在当时的匈牙利也存在。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若不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理论旗帜,不把创新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是非常危险的。在实践中不仅会失去维系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也会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说,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理论上清醒是政治上清醒的保证,理论上先进是政治上先进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题”就向世人完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理论上完全成熟的党,它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新世纪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些论述,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共产党人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因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探索和创立他们的新理论时,就将希望寄托于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身上。他们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们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新理论的目的,就是在批判德国哲学的过程中,引导人们用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使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虽然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演进历程,但它的发展主要是植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它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又在指导实践、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一次从社会政治斗争舞台退回到书斋,或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而进行理论探索时,都是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总结概括出新的思想观点或论断,或者根据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然后,一方面按照新的理论概括指导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修改、或取代、或批判已有的结论和判断。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中,曾做出“革命已经迫近”的判断,并明确提出革命将“不间断地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制度将在这场革命中被毁灭。但 1850 年 5 月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曾经准备了 1848 年革命的 1847 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3](第 206 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毅然抛弃了原来的判断,总结出切合历史新发展的论断:在资本主义“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5](第 470-471 页)。对此,恩格斯在 1895 年 2 月又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3](第 510 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发展观是科学的,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更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第 337-338 页)。

因此,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必须要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所说:“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里既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更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著作和理论,强调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们要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前,首先要认真地、客观地对它做一番研究,然后结合社会现实和科学的新发展,特别是直接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加以应用,反对从原则出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的任何倾向。恩格斯曾对 19 世纪 70 年代末在法国出现的把马克思著作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恩格斯在审阅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加·杰维尔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书稿时,发现其中对《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就严肃地批评杰维尔只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错误的意义”^[6](第 422-423 页)。9 年之后,1893 年,当屠拉梯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有人正准备用意大利文出版杰维尔的书时,恩格斯再次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6](第 552 页)。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之际,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背诵的教条和应付一切的公式。对此,恩格斯在致左尔格信中批评德国人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工人运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又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3](第 680, 681 页)。“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强调必须因地因时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物来决定,等等。所以,恩格斯当时谈到英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必须抛开德国的特点,要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谈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时,必须完全脱去外国的服装,成为真正的彻底美国化的党。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正确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在任何时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都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脱离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抽象地谈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用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错误的;不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就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所以,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在当代中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三、唯物史观的彻底运用和重要理论贡献

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揭示,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协调发展的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实践活动的统一。因此,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植根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又融入我们党对这一基本矛盾理论的当代理解和正确处理,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科学内涵。所谓“当代理解和正确处理”,集中表现在江泽民的一段论述中:“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逻辑起点,以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枢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它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应是整体推进、各方面协调发展。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由此深刻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运用和理论贡献。

生产力理论既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又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从理论上说,对生产力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正确与否,决定着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认识的正误和实践活动的成败。从历史看,生产力范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明。最早提出生产力范畴并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英国、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们。他们虽然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问题,但由于他们脱离了社会历史实际,并没有对生产力范畴做出科学的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哲学时,把生产力范畴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早在他们合作撰写的第一部巨著《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提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云雾中”,而“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他们认为,“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认为“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是“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准绳^[7](第191页)。在他们合作撰写的第二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中,就科学地揭示和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部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的历史地位。他们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5](第80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5](第142,19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思想资料和深刻研究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对生产力理论做出了新贡献。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对生产力理论做一般的论述,并作为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理论支撑点。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面临的直接任务。甚至可以说,列宁在世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未提到历史日程上。列宁逝世之后的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这些国家党的领导

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生产力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清楚,以至将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作为着重研究和实践的首要问题。认为建立了全民的和集体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就自然发展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没有大的发展,反而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者,都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2](第 116 页)。即只重视生产关系的改造,急于建立起公有制制度,从理论讲,这些执政党的领导者,都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第 116 页)。

因此,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首条,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80 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生产力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这里强调的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其一,我们认为,之所以强调“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就在于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3](第 532 页)。所以说,强调“必须始终”既是强调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办事,又表明我们党是在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第 116 页)。

其二,我们还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这里,“先进生产力”的理论含义是深刻的。其中,既含有关于构成生产力因素的新思想,又含有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的理论问题。因为,生产力是发展着的、开放性的系统,而它的因素也因时代发展的不同而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就当代生产力系统论,它应由多种不同类型因素组成:如主体性的因素,生产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科学技术;教育;资金和信息;以及生产环境等。这里强调的先进更具有当代性,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它是当代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日益智能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不仅劳动者不断智能化;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也在不断智能化;生产管理更是不断智能化。但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多维的动力系统,既有生产关系方面的诸多因素的推动,也有上层建筑方面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从整体上说,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系统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首先是科学技术;其次是先进的社会意识,这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再次,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经济动力。再其次,生产力系统自身的矛盾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最后,社会需要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最深层的动力,这是动力的动力。所有这些方面,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四部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已被十分具体地揭示出来。这部分开头做了很好的概括:“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本世纪头 20 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现代化建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人作为生产力动力系统中最活跃的能动要素,其素质的提高和发展,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创造性的动力,因为其他动力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都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现的。为了推动人的素质全面提高,造就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五、六两部分,从政治、文化、软硬环境方面做了很好的规定。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目的完全一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0](第 163

页)。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说,在现实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了群众利益的根本地位,体现了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统一;在理论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统一。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永恒主体,也是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选择和理论保证。因此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彻底运用,又是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乌克兰] 格·克留奇科夫. 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若干教训[J]. 国外理论动态, 2003, (2).
- [5]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德]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 [7]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 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严 真)

New Developments of Marxism in China

ZHU Chuan-q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Chuan-qi (1928-),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of the 16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ists in 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as the guiding though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reflects correctly the new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and China to our party and our country, is the theoretical weapons of knowing and mastering scientifically the laws of being in power of Communist Party,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laws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is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Marxism; advanced produce forces